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党的人才工作思想及实践

□欧阳雪梅¹ 孟凡涛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09;
2. 中共济宁市任城区委党校, 山东 济宁 272000)

[摘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党的人才工作全面展开的时期。为彻底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 党提出要建设一支宏大的人才队伍, 把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与团结教育已有的知识分子相结合, 把争取外援与自主培养相结合, 把学校教育与实践锻造相结合, 把建设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作为重点, 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制定发展规划确立体制机制引导人才成长, 创造条件成就人才, 尊重爱护人才, 激发各级各类人才的积极主动性, 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人才工作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599(2022)03-0088-09

人才对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起着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1]这是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才工作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党的人才工作全面展开的时期。为彻底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党提出要建设一支宏大的人才队伍，把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与团结教育已有的知识分子相结合，把争取外援与自主培养相结合，把学校教育与实践锻造相结合，把建设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作为重点，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制定发展规划确立体制机制引导人才成长，创造条件成就人才，尊重爱护人才，激发各

级各类人才的积极主动性，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支宏大的人才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指出：“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2][P2]}这明确了科学技术专家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

[收稿日期] 2022-03-20

[作者简介] 欧阳雪梅(1965—)，女，湖南汨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孟凡涛(1971—)，男，山东滕州人，中共济宁市任城区委党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基本政治理论。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的阶段研究成果。

家”^{[3]P176}提上党的议程。周恩来指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4]P807}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提出，“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队伍，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5]P620}这反映了党对人才需求的认识程度。1957年7月，他进一步强调：“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6]P435}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培养、吸引、团结、引领各级各类人才投身祖国建设，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广泛的人才支持。

二、把工农干部培养成知识分子，要求既懂政治又懂业务

为担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任务，毛泽东向全体共产党人提出了学习任务：“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7]P1481}，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195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要求各级党委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8]P396}。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干部要又红又专。他指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2]P309}为此，党中央作出了如下努力：

一是提升工农干部理论素养，并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置于首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重新审定了一套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在内的12本“干部必读”书目。这是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教材。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强调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应把理论学习与批判封建残余思想结合起来。中共中央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兴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党中央采取了党校教育、在职教育和学校教育、业余培训齐头并进的多元培训途径。加强党校干部轮训。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马列学院（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构成的党校教育体系，提出将党的干部教育的目标转为培养懂经济

的城乡领导者、建设者和管理者。1964年2月，毛泽东就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作出批示：为了适应客观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高级干部必须认真坐下来读书，补一补课，并组织必要的学习辅导。^{[9]P185,186}中央同时下发干部选读著作目录，共有30本书，以养成他们好学深思、钻研理论的习惯。

二是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干部队伍结构中占主体的是工农干部。据1949年下半年统计，“在326.5337万名地方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3%，工人出身的占5.87%。”^{[10]P260}为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建设事业的需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创办人民大学，培养建设人才，这是完全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点。”^{[11]P87}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开学，第一届学生3000余人（包括本科、专修科、文化补习班），其中有工农革命干部1827人（工作经历8年以上的有570人），进步工人172人；全部学生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733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团员651人。^[12]

加强在职干部教育，把工农干部培养成知识分子。开设各种工农速成学校、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班）和技术专修班，采取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一批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达到中等文化程度，一些学习成绩好的直接进入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学习。有计划地培训各领域干部。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给西北局发出了《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电报》。1950年，政务院颁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同年8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选调优秀干部建立和充实解放军各总部和军兵种机关，组建军事院校，培养大批军事干部。

三是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指导，派遣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农干部到苏联考察学习，提高干部的领导能力与管理水平。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1949年夏，毛泽东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要求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8月底，刘少奇即带回了220名苏联专家。斯大林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所有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学会，能够没有困难地管

理他们的工厂和企业,而不需要他们在中国服务的时候,他们就回苏联去。”^{[13]P86}随着“一五”计划开展,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11527名苏联和其他国家专家来华工作,其中苏联专家占89%,约10260人。^{[14]P96-106}到1960年海军聘请的苏联专家和顾问累计3390余人,^{[15]P44-45}还有空军、炮兵、通讯兵、导弹部队等其他技术兵种专家。有学者估计,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16]虽然受聘专家中有安排不当的,也有素质不高的,或照搬苏联一套的等情况,但总体而言,苏联专家能够为我所用,中方也努力掌握主动,向专家学技术、学本领。新中国成立的两年中,我国向苏联发出42个设计组的聘请书。陈云、李富春提出:“凡是请苏联设计的工厂,我们可以派人参加设计,并进行学习”,“同时在各工业部门逐步设立自己的设计机构,聘请苏联设计专家带徒弟,培养人才”。^{[17]P378}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以“一五六”工程为核心的、涉及能源、机械、电子、原材料等多个重点行业近千个工业项目建设中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

四是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党中央要求从1953年7月至1954年12月,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都要学习“联共(布)党史”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内容,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問題,“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先后六次建议和倡导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18]P499-500}。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带头组织读书小组读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在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的读书小组读完了12章至16章及结束语。他读书过程中的谈话,“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相关的国内政策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正确和富有价值的重要理论观点。”^[19]党通过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解决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将取得的经验迅速推广,指导与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与团结教育已有的知识分子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时,国家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文盲率高达80%,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国的产业工人不过三百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三十万人”。^{[20]P45}这显然无法与国家建设需求匹配,党中央采取的办法是,“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21]P1082-1083}。

新中国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政府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绝大多数都继续给以适当的工作,对学用脱节与缺乏为人民服务观点的知识分子,“经过训练或其他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技能,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22];在政治方面,党给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生,教育者受教育。党组织他们参观工厂和农村,访问苏联,参加各种国际活动,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把他们逐步地变成为工人农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人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并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中积极发展党员,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观点、同党忠诚合作的党外朋友。知识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1956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P162}。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新中国建设现代教育体系,普及小学教育,实行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设、技术教育、专科人才培养都以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1952年下半年,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23]P160}的方针,全国各地高校分期分批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迅速开展为国家建设培养和输送人才。“我们的教育方针,应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P226}为尽快普及教育、提高工农知识水平,1958年5月,刘少奇提出

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办半农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的教育方式带来了显著效果。全国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下降到1964年的33.58%。1965年底，高校毕业生1957—1966年累计139.2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211.1万人^{[24]P76}；半工半读学校6.1万多所，在校学生443.3万人；函授院校（部）171所，函授生近19万人；全国业余高等学校964所，在校学生41万人，^{[25]P190、191}各级各类学校为国家建设输送了一大批生力军。

新中国初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从1950年9月开始，中国往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留学生和进修生。到1965年这16年间，派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人员总数1.6万多人，有留学生、技术实习生、研究员。其中，留学生8414名，到1965年，学成回国的有7324人，占87.05%。^{[26]P5、6}技术实习生是陈云、李富春主张派的。他们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信，认为派技师、技工到苏联实习一年半载，“可以减少开工初期由于不熟练而产生的各种浪费（机器转不动，产量少质量低等）”。^{[17]P378}去苏联留学的人员不仅回国率非常高，成才率也很高。30年后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在这批留学人员中，产生了一名国家主席，一名国务院总理，多名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200多位正副部长及省部级官员，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高级将领。^[27]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中共中央加强人才的自主培养工作。1960年，中央决定在1959年3月设置20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基础上，再增加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共计64所，“优先适当满足尖端国防方面的研究、设计、生产部门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尖端专业所需要的师资和研究生”^{[28]P575}。

随着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1964年开始派遣高中毕业生到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留学。“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家停止向外派遣留学人员。1971年中美两国关系破冰，毛泽东在与基辛格的一次会谈中提出，中国准备“将年龄不是很大的孩子们”送去美国学习。1972年起，中国恢复了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政策。据统计，从1972年—1978年间，国家共向49个西方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26]P6}当时向西方派出的绝大多数留学

生主要学习所在国语言，满足外交活动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同时开启了新中国出国留学多元化的新阶段。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人才与培养各类人才相结合，满足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四、珍视科技人才，培养和健全科学人才队伍

恢复国民经济，并把我国建设成为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很差，人才严重短缺，科研机构大约40个左右，研究人员有650余人，科学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据估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1125万人口中有一个科研机构，每10万人口中才有一名科研人员。^{[29]P168}并且，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发展不平衡，“除了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地域性调查工作和一些可以不依靠实验设备而勉强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外，现代科学技术在旧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30]P4}。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集的学术界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过去三十年中，自然科学方面是弱一些，因为革命运动多，不免偏重于社会科学方面，但政治局面打开了，这就使科学有新的发展的可能，使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人民服务。”^{[4]P483-48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11]P249}

团结科学家是党的重要政策。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以统筹及领导全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担负培养与组织科学研究人才的工作。中共中央强调，“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必须重视和尊敬他们，必须争取和团结一切科学家为人民服务。对于少数历史上有过反革命活动的科学家，也应当争取并适当地加以使用。”^{[31]P371-372}发挥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的积极性，合理地使用他们发挥其专长，关心与帮助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条件，有贡献的科学家让他们得到较高的薪金和适当的荣誉。

为解决急需的高端人才,新中国成立前后采取积极政策,召唤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归国效力。1949年4月,郭沫若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郭沫若给李四光带去了周恩来“请李四光早日返国”的信件,之后,安排保护李四光回国。新政协成立之后,周恩来提名李四光为政协委员,并指示李四光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肩负起国家建设的主要责任。1949年12月,国家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为留学生归国后办理相关事宜提供便利,工作分配时从积极方面考虑如何发挥他们的专长。1949至1954年登记在册的归国留学生一般都能顺利就业,就业人数占登记人数的97.6%。^{[32]P215}及时解决科学家的困难。1950年9月,物理学家赵忠尧回国途中被驻日美军扣留,导致其在国内的家属陷入经济困境,中国科学院聘任赵忠尧为研究员,按照研究员薪级标准的70%给家属发放生活补助费,直到赵忠尧回国后到研究所工作为止。钱学森被软禁时无法给父亲汇款,中国科学院将钱学森纳入编制,按照标准向他的父亲发放生活补助费。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美达成协议,用战争中的美国俘虏换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许多曾经历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海外学子具有强烈的报国之志,愿意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响应祖国的呼唤。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经达到3000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32]P215}形成了第一波海外知识分子归国热潮。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了第二次留学生回国潮,这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派往苏联和东欧的留学人员相继完成学业后回国。

诸多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又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归国,迅速成为各行各业的主力军,很多人成为相关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据统计,新中国初期从欧美归国的科技工作者有三分之一分配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他们在自己擅长和国家需要的学科领域创建研究机构,配合国家科技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并为国家培养人才。1950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方面的18个研究所的所长全部是归国学者。^[33]在国防事业中,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留学背景的人达21位。^{[34]P3}他们把祖国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在建设祖国的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

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建立激励科学技术人才的制度与体制机制。1950年8月,政务院颁发《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通过《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鼓励大家充分发挥其知识、经验与智慧,以促进生产事业之恢复与发展。中共中央号召把专门技术人才放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岗位上去。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233名优秀科学家成为首批学部委员。1957年初,中国科学院首次颁发1956年度科学奖金,奖励华罗庚、吴文俊、钱学森等在科研领域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1956年初,党中央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近百名苏联专家与几百名中国科学家一起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规划提出了57项重要科技研究任务,包括世界前沿科技课题、国家工业建设的重大科技问题、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福祉的重要问题以及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赶超战略,规划发展高新技术和基础学科,以任务带学科,引领科研人才成长;中国科学院、高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地方科学研究机构在重要的科学实验中合理分工,实行科学协作,也推动了人才的迅速成长。高等学校与中等专业学校把加强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并根据“掌握重点、照顾其他”及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全面规划。^{[4]P551}中宣部指导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编制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1962年,中国提前完成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主要科学技术领域几乎都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3]P412}1963年11月3日,国务院发布《技术改进奖励条例》《发明奖励条例》,鼓励群众改进技术的积极性,鼓励发明和推广应用发明,包括华侨和外国人都可以申报发明。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前一个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的情况,又组织编制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科学技术事业规划及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建立适用科学技术干部特点的管理制度。1964年3月,中共中央批示中央组织部上报的《科

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改变过去沿用管理行政干部管理科学技术干部的办法，建立适用科学技术干部特点的管理制度。国务院专门设立科学技术干部局，负责统一管理科学技术干部的行政机构，委托国家科委代管。中央要求参照这个条例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1965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科委党组《关于科学技术对外工作的报告》，要求国家科委和各部门的外事机构，健全和加强科学技术对外工作，充实专职队伍。

在政治运动中，党中央对科技专家的态度更包容、更慎重，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反右”运动中，邓小平一再在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划右派要慎重，明确：“右派中凡有真才实学的都继续用。我们赞成他搞科学，只反对他反社会主义。他们完全可以改变，为社会主义服务”^{[35]P335}。1957年9月2日，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稿时，他加写了一段文字：“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35]P335}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批示：“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28]P600}

党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行为示范作用。如上将宋任穷年近50岁时，毛遂自荐，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奔走呼号，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组建原子能事业领导机构。铀资源勘察是原子能事业发展的基础，他抓铀矿地质工作，几乎都跑遍了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和自治区的铀矿地质勘探队，“与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36]P286}。这样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新中国出色的领导者和科技工作者团结奋斗、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核工业平稳有序地实现全面自力更生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国家相关政策体制机制引导下，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既研究原子能等世界前沿科技课题，也走向田野、车间，甚至在戈壁沙漠、海岛滩涂、荒山野岭或茫茫草原上安营扎寨，把科学研究与社会生产、人民生命健康结合，

开展小麦和水稻品种培育改良、农药化肥研制、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地质勘察、石油勘探开发、钢铁耐火材料研发、铁矿冶炼，以及抗生素研制、寄生虫防治、地中海贫血治疗、基因工程、中医药研究等，不仅实现技术革新，并在自然科学大众化和普及化运动中担当主力，为切实提高人民科学素养服务。^[37]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并在大型攻关项目中造就了一批功勋科学家，实现了中国在技术人员数量和技术装备水平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的情况下，突破技术的障碍，比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取得“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大庆油田在攻坚克难中积极探索了技能人才培养模式。1960年大庆油田会战开始，国家给予人才大力支持，1960年以后国家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共5375人，占技术干部总数的70.6%，其中大学毕业的3461人，中专毕业的1912人。大庆油田“对技术干部在工作中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严格要求，热情帮助，使他们有职、有责、有权地进行工作”^{[38]P179}，技术干部在实践中迅速锻炼成长，创造了“大庆经验”：五年来，这支技术干部队伍发展到7500多人，主力是青年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半。在大、中专毕业生中，被提拔为工程师以上的干部617人。仅1965年上半年就试验成功新技术3200多项，858项已用于生产。大庆油田不仅给自己培养了大批技术力量，而且支援了兄弟单位2000多名技术干部。^{[38]P174-175}

五、有错即改，不断调整完善人才政策

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在探索中前进，在试错中纠偏，在人才工作中也不例外，一发现问题就在调查研究后进行调整，完善政策。新中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思想批判造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压力，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了“双百”的方针，鼓励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为解决党内存在着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问题，中共中央制定了相关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积极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1956年6月，《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不仅对重工业部门、重点建设地区、高级技术工人和高级科学、技术人

员、小学教职员的工资有较大提高,而且,对有重要贡献的高级科学技术人员及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加发特定津贴。改进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改进外国书刊进口、翻译、出版工作状况,改进国内学术著作出版状况;加强科技情报、国际学术交流;配工作助手等。^[39]

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升级时,毛泽东仍然注意分化和争取右派分子,指出:“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18]P198},并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邓小平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的报告中强调:“现有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虽然现在多数是中间派,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愿意进步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计划,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用妥善的而不是粗暴的方法使他们逐步脱离中间状态,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来。”^{[35]P338-339} 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批示,要求“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2]P464}。基于上述判断,1959年8月,中央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到1962年,被错误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帽。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思想。但在1958年的“反浪费、反保守、向又红又专大跃进”的口号中,却将“双反”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红’的因素即‘政治’被过多的强调,而‘专’却更多地与‘白’字连在了一起”^{[40]P584}。这就造成了人们不敢言“专”。党中央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纠偏。聂荣臻指出:“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的人们的政治立场。”“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41]P234-235},对国家有贡献就行。从1961年上半年开始,党中央着手制定一系列有利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条例,如“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十条”等。7月发布的“科学十四条”,明确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科研人才”^{[42]P473}。中共中央强调“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切实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帮助他们做出成果^{[42]P445};在“大计划”之下还可以有“小自由”。“在国家计划以外,保留一些自由选题,是

有利于进行科学探索的。”防止人才的使用、培养、提拔上“平均主义”倾向,对于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予以重点支持和重点培养。优秀科研人员的提升,“应该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42]P477,482}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共中央认为,搞好知识分子的团结关键是两个:一是尊重,二是关心。尊重人家,相信人家革命,以平等的态度相待,有什么事情互相商量,使人家真正有职有权,真正感到这个国家大家都是主人。政治上关心,工作条件、环境要帮助解决。1962年,陈毅提出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重新强调“是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43],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1962年11月开始,内务部对经国家分配的高等学校毕业的110余万人干部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对存在着学用不一致和使用不当的干部进行调整,安排了他们做所学专业工作,贯彻“学用一致,专才专用”的原则。^{[44]P186}

1964年5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奖励了12个先进单位和33个先进工作者。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的社论,强调“科学技术人员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坚决完成国家交付的工作。就是认真从事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关键,把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对科学技术干部要从本质上去看,不要从枝节问题去看。主要应当看他是不是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不是把饱满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积极完成党和国家交付他的工作任务。要充分发挥老一辈专家的作用,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培养科学技术专家的后备军。这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利于人才的成长。

由于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人才队伍特别是最薄弱的科技队伍取得了大发展。到1965年底,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已达245.8万人,其中有研究生学历的16万人,大学毕业学历的113万人。全国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人员达到12万人。^{[30]P31}我国农业科学技术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由解放前不足千人,发展到1.5万人,推广站的技术人员由解放前的寥寥无几,发展到近5万人。^{[45]P115}“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广大科技人员、专家、学者横遭批斗,荒疏了业务,停课闹革命、中断高考,少培养了一

批人,中国人才队伍遭受严重损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竭力保护了一批科学家。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强调“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46]^{P34}人才工作在艰难推进。新中国成立70周年8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和28名国家荣誉称号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改革开放前培养成长的人才。

六、结语

习近平指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1]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用学习来提升干部治国理政的本领,号召“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7]^{P1481},提高干部德才素养;另一方面,坚持党管人才,坚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

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47]^{P170},激发了人才的主动性、创造性,不仅有“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的“两弹一星”研制专家,而且,各领域的人才同样有极强的荣誉感与使命感,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己之力,从而推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国防、外交事业有很大发展。

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时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48]这就需要把人才培养的着力点放在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培养上,为他们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和保障;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N].人民日报,2021-09-29.
-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周恩来文化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4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0]朱汉国.中国共产党建设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2]新国家的新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介绍[N].人民日报,1950-10-10.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4]1959年4月1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Z].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
- [15]肖劲光回忆录(续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 [16]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1).
- [17]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9]王定毅.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学习[N].学习时报,2022-02-23.
- [20]陈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2]政务院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N].人民日报,1951-01-14.
-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2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 [25] 方晓东, 李玉非,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
- [26] 苗丹国. 出国留学六十年——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导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的形成、变革与发展[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 [27] 刘学红. 新中国出国留学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评《出国留学六十年》[N]. 中国青年报, 2011-01-04.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3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29] 聂荣臻回忆录[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7.
- [30] 武衡, 杨浚. 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 [31]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 第 15 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32] 《辉煌 70 年》编写组. 辉煌 70 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 [33] 王安轶, 丁兆君. 新中国成立之初留学归国的科技工作者[N]. 科技导报, 2020(10).
- [34] 李滔. 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35]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 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36] 宋任穷回忆录[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7.
- [37] 欧阳雪梅. 新中国以科学家精神推进科技创新的历史考察[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0(6).
- [38]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 第 50 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39]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 [40] 刘克选, 方明东. 北大与清华[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
- [41]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 第 37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4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43] 廖心文. 1962 年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J]. 党的文献, 2002(2).
- [44]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 第 46 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20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46]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48] 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N]. 人民日报, 2022-04-30.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he Party's Talent Work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OUYANG Xue - mei¹ MENG Fan - tao²

(1. Research Center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2.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Rencheng District, Jining City, Jining 2720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as a period in which the Party's talent work was carried out in an all-around way. To thoroughly change the country's image of poverty and blankness, the Party proposed to build a brand talent team, combine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intellectuals and the unity and education of existing intellectuals, combine the foreign assistances with self-cultivation, and combine school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training, made the most efforts to build a strong team of professional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ollowed no set form to cultivate talents. Besides, the Party set up development plans and established mechanisms to guide the growth of talents, created conditions to help talents grow, gave respect to and cherished talents, and stimulated the activity and initiative of all talents to assume the mission allocated to them by the age.

Key words: CPC;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alent work

(责任编辑:邱明)